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 总主编 罗以澄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 主编 罗以澄

法治视阈下大众传媒与 政治文明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Rule of Law

强月新 赵双阁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 总主编 罗以澄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 主编 罗以澄

法治视阈下大众传媒与 政治文明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Rule of Law

强月新 赵双阁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治视阈下大众传媒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强月新,赵双阁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5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罗以澄总主编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罗以澄主编

ISBN 978-7-307-08541-1

I. 法… II. ①强… ②赵… III. 大众传播—传播媒介—关系—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国 IV. ①G206.2 ②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353 号

责任编辑:黎晓方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荆州鸿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0.25 字数: 431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541-1/G · 1932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国家“985”工程二期项目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课题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

总 主 编：罗以澄

编委会主任：罗以澄

编委会委员：许汉生 石义彬 单 波

张金海 秦志希 强月新

王瀚东 吕尚彬

特邀编委：李良荣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

主 编：罗以澄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

研究书系·序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繁荣兴盛，以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勃兴和传播新技术的扩散，我国社会正在急剧地向媒介化社会转型。社会的媒介化趋势持续建构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子系统，从而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结构化，并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创造及跨文化传播的交流方式。如何理解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的关联，认识媒介化社会的本质，寻求中国在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动力；如何解决媒介化社会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理应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在2005年年初，武汉大学的“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创设了“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并设置了“新闻传媒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系列课题，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上，开始致力于新闻传媒与媒介化社会这一重大课题的艰辛探究。现在推出的《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便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书系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研究维度上，探索新闻媒介与社会改革的互动是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转型，以及新闻传媒又是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要素的。其中，《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一书集中于揭示在中国社会与传媒双重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与传媒转型之间的互动互构，从而形塑中国媒介化社会的内在机制；《法治视阈下大众传媒与政治文明建设》一书侧重于揭示在依法治国、民主和谐的视野下，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互动与互促，从而推进社会的传媒系

统与政治系统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媒介文化新视点》一书重在探究新闻传媒与社会文化进步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当下多元文化冲突与新闻传媒的文化责任；《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则着重分析在今天的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新闻传媒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与机制；《报业数字化生存与转型研究》一书，侧重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揭示了传播新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报业数字化生存与转型的内在机制；《传播新技术：影响与对策》一书侧重于探索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对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影响与促进，以及对于传媒生态的作用与优化机制。

从总体上看，这套书系在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一，前瞻性。《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的各部书稿，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于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媒介化社会发展的演进逻辑的分析，但我们更重视对于新闻改革和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当下问题的解决，更重视对其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与分析。例如，《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传播新技术：影响与对策》等著作立足于和谐社会构建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范式，来审视中国的新闻传媒与社会转型的互动、互构机制，来探索新闻传播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如何达成和谐与契合，从而实现新闻传媒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前瞻性探索，是这套书系的学术旨趣的重要方面。

第二，战略性。在今天的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情境下，我国的新闻传媒生态和发展态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而又剧烈的转型和变迁，新闻传媒的发展正处于市场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民本化转型的关节点上。如何在有效地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提高传媒竞争能力，把我国新闻传媒做大做强的同时，建构新闻传媒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科学发展进路，营造和谐、健康的新闻传媒发展生态，把握好信息公开、传播自由和规范化调控的辩证关系，从而促进新闻传媒的社会公正的守望者、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共识的推进者、社会利益表达的枢纽站、社会冲突的减压阀等功能得以最佳发挥，是我

国新闻传媒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好的宏观战略问题，这也正是这套丛书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三，创新性。中国的新闻改革与媒介化社会发展趋势，是今天全球传播学者共同瞩目的学术问题，也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华人学派提升学术话语影响力的基础领域之一。这套书系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首先推出的分析与解决“中国社会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这一复杂性问题的系列专著。其间，对我国新闻传媒改革与转型的概貌富有学理深度的呈现，对我国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的深度揭示，对我国新闻传媒与政治文明、文化转型、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究，对多元文化背景下新闻传媒实施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的观照，对传播新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影响的分析等方面所形成的创新观点，希望能够给予人们以启迪。

这套书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研究团队精诚合作的努力，没有全体作者和撰写参与者的创造性劳动，就不会有这套书系。作为这套书系的主编，我要向各位作者及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向武汉大学出版社及其学术分社的领导、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他们的鼎力支持，这套书系才得以如此迅速地顺利问世。当然，我也要向各位读者表示感谢，你们的接触和阅读，是书系价值实现的最终环节，你们的意见更是促进这套书系臻于完善、思想臻于深邃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罗以澄

2009年12月于珞珈山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法治、传媒与政治文明	23
第一节 政治文明概述	23
第二节 法治与政治文明	43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政治文明	69
第四节 大众传媒与法治	104
第二章 传媒社会中舆论监督法治建设	128
第一节 舆论监督概述	128
第二节 舆论监督法治建设的基本关系	150
第三节 中国特色舆论监督法治建设路径选择	217
第三章 传媒社会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255
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与政治文明	255
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与大众传媒	290
第三节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320
第四章 传媒社会中公民政治参与体制的构建	356
第一节 传媒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	356
第二节 大众传媒与公民的法律参与	384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公民的公共政策参与	421
结 语	467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变迁

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文明”，但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却无不蕴含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尽管毛泽东在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所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等思想却奠定了我国建设政治文明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

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全面启动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没有提出和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认识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就不可能成功，于是就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规划和部署，主张通过改革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真正启动。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议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在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继

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任务，并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实行“党政分工”。十二大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随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现象日益显露，邓小平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同时，还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法制建设。以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启动。但是，苏东剧变和“六四”政治风波发生致使中央改变了预定的改革方案，“从着重解决原有体制的‘总本根’——权力的过分集中转移到完善那些本来就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上来”^②。

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对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推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路，系统地阐发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理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精神，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6页。

② 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中国经济时报》2003-04-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强调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各项政治制度。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着重阐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认“人权”概念，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确认“人民主权”概念，提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把监督和民主联系起来；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法”，不能把违背领导意志当作“违法”，任何个人意志不经过法律程序都不能成为治国准则；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成为党章的一项重要原则。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他继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之后，又一次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问题，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①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第一次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了全面部署，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②同时还提出，必须做到九个方面的工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

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集体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阐发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斗争的重要启示，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其目的是促进全面发展，其原则是保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

2003年9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出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他指出：高度重视

^① 《江泽民“5·13”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他强调：坚持政治文明的建设方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执政党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胡锦涛还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符合人民利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形成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以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以人财物的管理和使用为重点，以关键岗位和薄弱环节为重点，改革和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切实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大会提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些任务和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既有明确的具体目标，又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传媒体制的变迁^①

传媒体制就是传媒业的组织制度，它包括传媒业的所有制及行政隶属关系、内部结构、组织体系、人事制度等，其核心是传媒业相对于政府及执政党的角色定位。在中国，传媒制度实际上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媒制度基本性质的核心原则是“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并在政策规范上得到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媒“体制化”的制度安排是对苏联宣传规范和媒体制度的全面机械照搬，因而被韦尔伯·施拉姆等人将中国当时的传媒制度归属于“报刊四种理论”中的苏维埃-极权报刊理论（以前被翻译成苏联报刊理论），其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媒体属于国有并被严格控制，媒体只是作为国家的助手而存在。^② 韦尔伯·施拉姆认为，这种传媒制度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媒体对整个国家体制和政治过程的完全“融入”，媒体不是游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旁观者（stander-by）、监督者或所谓的“第四权力”、“第四等级”，而是被收编在政府体制之内，成为“整个政府的一部分”，如同“国家队伍中的一名士兵”。^③ 也就是所谓的媒体的“机关属性”。这就意味着媒体的四大权力：媒体领导的任命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宣传内容的终审权都被党政机关所控制。正基于此，中国大众传媒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也就顺理成章。

^① 本部分主要参阅童兵：《政治文明：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突破体制瓶颈推进新闻改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周年》，<http://www.studa.net/xinwen/090725/14420332-2.html>；李良荣、张大伟：《新闻改革与深化新闻改革——李良荣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李良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纪念新闻改革25周年》，《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② Werner J. Severin, James W. Tankard, Jr.: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③ [美] 韦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

不过，随后出现过两次产业化改造的短暂历程。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时期，中央在报社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许多报社做到了经费自给。这段历史到1957年由于媒介生态的变动而中断了。第二次产业化进程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新闻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第二阶段从1989年至1992年，体制改革停滞三年；第三阶段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至2000年，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为原则。

在第一个阶段里，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从微观层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恢复广告经营（1979年开始）、自办发行（1985年开始）、扩版扩台（1988年开始）、开展多种经营、制播分离、人事用工制度、工资奖金制度，等等，基本上形成多样化的报业结构；报台之间、报台与新华社之间的竞争已经展开；在一张报纸上有时可以听到反映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声音，初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的新局面。一些地区和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些先进理念在实践中进行了落实，试图建立多种新闻传播渠道，便于广开新闻信息资源，扩大报道面，加大信息量，利于新闻媒介之间和新闻工作者之间展开社会主义自由竞争；在新闻编辑方针同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情况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权形式的新闻机构；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放开经营自主权，让负实责的媒介编辑部自己对报道内容负责，同时享有完全的经营权。但是，由于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新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造成连续三年的停顿。

在第三个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解放了思想，使以改变新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闻改革征程又重新启航。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轰鸣声，我国传媒也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市场。不过，那时的媒体改革从整体来说是从下往

上进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央对一些重大的改革确实没有经验，还没有完全顾及我们新闻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新闻体制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因而中央主要是把握方向，但具体的做法，比如创新，统统都是媒体自下而上介绍经验、提供经验，然后推向全国。比如说从邮发一统天下到自办发行、扩版、增版，等等。同时，新闻改革还是靠观念拉动，当然体制改革也有一点，但总体上靠不断地破除陈旧观念，引进新的概念来拉动新闻改革。

在这个阶段中，以1996年为界，这年之前我国的新闻改革是微观方面的，如业务上的改进、体制上的改良、经营上的改善等，而之后则走向体制的改革，通过体制的改革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如报业集团、制播分离、把媒体划分为经营性的企业和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等等。

2001年以后，以组建媒介集团，做大做强广电产业为标志，我国开始启动媒介产业化的改革进程。1. 新闻单位的“可经营部分”转制为企业。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除夕发布《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确认，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和重要出版社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等可经营部分，可以剥离转制为企业。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社会资本。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企业化。广电总局2004年2月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可以把电台、电视台、广电集团（总台）的除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特别是影视剧的制作经营从现有的体制中逐步分离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3. 电影制作向不同所有制开放。2004年年初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要求国有电影单位加紧转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公司制改造的同时，提出要努力扩大融资渠道，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探索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4. 部分广播电视频道经营的企业化。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广播影视

产业发展的意见》还提出，对于产业经营前景比较好，具备企业化运作条件的，如体育、交通、影视、综艺、音乐、生活、财经、科教等频道频率，在确保频道频率作为国家专有资源不得出售，确保节目经营权和播出权牢牢掌握在电台、电视台手中的前提下，经批准可以组建公司。5. 多数出版社和部分报刊转制为企业。中共中央、国务院 2006 年年初颁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转制为企业的出版单位有除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以外的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据新闻出版总署官员透露，全国现有 527 家出版社，除各级人民出版社保留事业单位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① 6. 主要新闻单位事业性质不变。在大众传媒领域，当把以上这些分离出去、转制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主要的新闻出版单位了。2006 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做出了可以认为是具有终局性的定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络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事业体制。”上述所列新闻媒体，是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主干，也是思想宣传阵地的核心，事关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当然要置于党和国家的直接管控之下。^②

2009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该规划指出要做好八项重点工作：一是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文化产业。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快推进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重大项目。三是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四是统筹规划，加快建设一批产业示范基地，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五是不断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新变化和审美新需求，创

^① 《中国青年报》2004-04-06。

^② 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0～391 页。